

中日两国古典文献中九尾狐形象的变迁

李嘉敏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人文渊源深厚。九尾狐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信仰之一，也影响了日本。古往今来，九尾狐形象在中国、日本古代的古典文献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瑞兽到妖兽，形象丰富多样。本文通过对比研究中日两国的九尾狐形象，分析中日九尾狐形象背后的中日文化。

【关键词】九尾狐；形象；古典文献；中日

【作者简介】李嘉敏（2002-），女，广东梅州人，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88（2024）07-0001-03

一、中国古典文献中的九尾狐

（一）瑞兽——九尾狐的祥瑞化

中国关于九尾狐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在《山海经·海外东经》中有：“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记载：“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可见，这时的九尾狐只是作为青丘国的一种异兽被记载，不含褒贬色彩。

进入汉朝，九尾狐受符瑞学说、儒家传统道德、道家阴阳五行学说等思想的影响而逐渐变成了瑞兽。《白虎通》中记载：“德至鸟兽则……狐九尾……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其中，“德至鸟兽则狐九尾”体现了符瑞思想，将九尾狐作为品德高尚的明君出现的吉兆。“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则体现了儒家传统道德中的不忘本，讲仁义。“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体现了道家的阴阳五行思想。在中国古代象数与五行中，“九”是最大的阳数，表示“极阳”，而“阳”在古代多指男性，故“九”、“阳”包含生殖崇拜之意。九尾对应九妃，体现了生殖能力强、子嗣繁盛。子嗣繁盛，从而皇权不断、后世昌盛。此外，《吴越春秋》中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必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其中体现了符瑞思想，九尾狐被看作是适宜婚配的男性配偶的祥瑞之兆，是君王、国家昌盛的象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国家分裂，政治混乱的影响，百姓渴望统一和平，同时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九尾狐的祥瑞之兆得以延续。曹植的《上九尾狐表》记载：“黄初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鄆城县北，见众狐数十首在后，大狐在中央，长七八尺，赤紫色，举头树尾，尾甚长大，林列有枝甚多。然后知九尾狐。斯诚圣王德政和气所应也。”这表明九尾狐在此

时仍被奉为祥瑞，是君王德政的吉兆。各方统治者借九尾狐的祥瑞之意企图证明统治的合理性，故为迎合统治者，各地多将九尾狐作为贡品献给统治者。所以这时九尾狐也多出现于各方的献瑞活动中。比如，《魏书》中记载“元象元年四月，光州献九尾狐。二年二月，光州献九尾狐。”

（二）妖兽——九尾狐的妖邪化

进入唐朝，九尾狐的原生意义发生了改变，开始妖邪化。唐朝盛行狐神崇拜，其中天狐崇拜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郭璞的《玄中记》中记载：“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从中可看出天狐是一种妖神。而九尾狐是天狐中的一种。《酉阳杂俎》记载：“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洞达阴阳。”这时的九尾天狐并非一开始就是九尾狐，而需经过道法修炼而成为九尾狐，这时的九尾天狐明显带有妖异色彩。

进入宋朝，九尾狐逐渐妖邪化。宋代文献描述九尾狐时多出现“野”和“妖”字。《宋九朝编年备要》中记载：“陈彭年薨，临其丧。注：涕泗良久，时为参知政事，彭年敏给记，好仪制刑名之学，素奸陶，号九尾狐。”其中描写了陈彭年是名奸臣，奸诈狡猾，故被人称为九尾狐。这里的九尾狐有奸臣一意。此外，《侯鯖录》中记载：“钱唐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这里的九尾野狐指妓女。又比如，《绵州录参厅观姜楚公画鹰少陵为作诗者》中记载：“妖狐九尾穴中国，共置不问如越秦。”这里的妖狐比喻入侵之敌。

进入元朝，九尾狐的妖邪形象延续。比如《奉使謁羔答理麻氏也》中记载：“复有老狐九尾而九头，扇妖作怪呼匹俦。”

进入明朝，九尾狐的妖邪形象达到顶峰。《金瓶梅》第七十五回中西门庆的大老婆骂潘金莲是九条尾巴的狐狸精，这里的九尾狐表示女性淫荡。《封神演义》中描述了有绝世美貌的苏妲己被父亲献给商纣王，途中被奉女娲之命惑乱殷商的九尾狐附身，而后色诱纣王，残害忠臣，使商朝亡国，最终被

姜子牙斩首示众一事。由此，九尾狐变成了红颜祸水、祸国殃民的代名词，彻底妖邪化。

进入清朝，九尾狐形象变得中和。一方面，小说《九尾狐》中的娼妓胡宝玉被称为九尾狐。其第一回中记载：“盖狐性最淫，名之九尾，则不独更淫，而且善幻人形，工于献媚，有采阴补阳之术，比寻常之狐尤为厉害。”这里的九尾狐表示女性极为淫荡。另一方面，九尾狐作为精怪，多以女性形象出现，与男性联系紧密，或吸人精气，或报恩书生。九尾狐更具人性化，善恶并存，如《狐狸缘全传》中描述了九尾狐玉面仙姑幻化为绝色美女，与书生周信相恋，吸其阳气，致其染病，后又因伤人而被砍去八条尾巴。但后来改恶从善，感念周信相救之恩，投胎为人与之成婚的故事。

二、日本古典文献中的九尾狐

日本关于九尾狐的记载，可追溯到平安中期。《延喜式》的治部省式祥瑞条中记载：“神獸なり、その形赤色、或いはいわく白色、音嬰兒の如し。”即九尾狐是神兽，其颜色为红色或白色，声音如婴儿。

其妖邪化的转折点在于玉藻前这一人物。成书于14世纪的《神明镜》记载了平安时代侍奉鸟羽天皇的美人玉藻前的原型是狐狸。室町时代的《玉藻物语》等书中记载了玉藻前为2尾七尺的狐狸，而非九尾狐。直到在江户时代的《绘本三国妖妇传》（1803~1805）中，记载了九尾狐先后化身为中国的妲己、印度的华阳夫人、中国的褒姒，魅惑君主，终至亡国，最终流亡日本成为鸟羽天皇的宠妃玉藻前，引诱皇帝，致其重病，但被阴阳师发现，最终被杀死的故事。而历史学家认为玉藻前的原型可能是为鸟羽天皇所宠爱的皇后藤原得子，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上帝位而出谋划策，设计让中宫待贤门院（藤原璋子）失宠，让崇德上皇和藤原忠实以及赖长父子对立，并引起了保元之乱，更是树立了武家政权先例。

此外，江户时期还有另外一种九尾狐，即政木狐，是一种善狐，见于读本作家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1814~1842）。其中记载政木狐是活了近千年的雌狐，因误杀了其恩人河鲤守如的儿子河鲤孝嗣的乳母政木，便化身为了政木，但在打瞌睡时暴露了真面目，所以消失了。后来，政木狐在忍池开了一家茶馆，帮助了九百九十九个旅人，积累功德成为了九尾狐。而后又救了将被处决的孝嗣。由此，救了千人性命的政木狐变成了狐龙升天，死亡后变为化石坠落在上总国。

三、中日两国九尾狐形象变迁的异同

中日两国的九尾狐形象变迁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第一，九尾狐的形象都经历了由瑞兽到妖怪，再至中和的变化过程。中国方面受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汉朝时受符瑞学说、儒家传统道德以及道家阴阳五行理论等思想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受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的影响，九尾狐被视为

瑞兽。其次，唐朝时，由于狐神崇拜和道教道家修炼的兴起，九尾狐的形象开始走向妖化。然后，宋明时期，市民生活的以及瓦舍勾栏的兴起，加之程朱理学中灭人欲的观念影响，九尾狐成为妓女的代名词。清朝时期，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创作的繁荣，使得九尾狐的形象呈现出善恶并存的特点。而日本的九尾狐的形象变化明显受到中国古典文献的影响。首先，《延喜式》中九尾狐为神兽，白色或红色，声音如婴儿，可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找到相似的九尾狐形象。《山海经·南山经》中记载：“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太平广记》中也有记载：“九尾狐者，神兽也。其状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国。音如婴儿。”《吴越春秋》中也提及九尾狐为白色。其次，玉藻前的形象受到中国妲己、褒姒等负面形象的影响。最后，受《封神演义》和玉藻前的影响，九尾狐在大众心中被普遍认为是邪恶的象征。然而，曲亭马琴却依据史书文献等材料进行考证，指出九尾狐原本是瑞兽、神兽。

第二，中日两国的九尾狐作为妖兽时多有化为人形的能力，并赋予其人格化特征。这一现象与“非常”有关，它与“常”相对，指一些特殊且无法通过日常经验解释的物类变化现象。学者李丰楙认为，在先秦时期气化宇宙观念的基础上，古人将生命形态分为两种：一是“生产”，即同一种类的“正常”的繁殖方式；二是“变化”，即不同种类之间的“特殊”“异常”的生命繁衍。前者是古人基于朴素的科学观察得出的合理认知，而后者则是以浪漫的神话思维对于未知现象的特别阐释，即物老成精和妖化人形。故“非常”和“变化”成为中国九尾狐化为人形的依据。而日本与之类似，出于对自然、动物的敬畏，日本人民把自己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控制的力量都称为妖怪，九尾狐化人形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三，九尾狐逐渐以女性形象出现，并且常与男性有联系，被抹黑妖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九尾狐作为一种比普通的狐狸多出八条尾巴的兽类，符合人类对于美的定义，加上狐性淫，以及九尾象征着生殖能力强、多产等观念的影响，九尾狐逐渐以女性形象出现。其次，中日两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尊崇儒家文化。儒家推崇三从四德，认为女子应该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且具有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要求“男主外，女主内”，女性不得干预朝政，若干政便被定义为扰乱朝政，祸乱朝纲，故当妲己、藤原得子干预朝政时，便把她们妖化，扭曲其在政治上的才干。另外，妇德要求女性坚守节操，对人恭顺谦恭，而明显妲己、藤原得子并非一味听从他人之人，她们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故被抹黑。妇容具体指对妇女仪容的要求是重质朴去修饰，而刻意修饰打扮等于引诱男人性情之欲。九尾狐作为兽类时，便十分美丽动人，化为妲己、褒姒、玉藻

前等人后亦是绝色美人，不符合儒家对女子容貌的要求，故被抹黑。然后，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下，男性是主导，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成为生育机器，在节欲的时代中，女性不能有性欲，若性欲旺盛则被视为淫荡，而男性性欲的体现则是其笔下多魅惑、淫荡、主动勾引男性的女性形象。最后，女祸论观念的影响。“女祸”主要是指女子因受宠信或干政致使政治动乱、国家衰亡。致使妲己、杨贵妃等女性的形象被抹黑。故逐渐以女性形象出现的九尾狐也被妖化。

第三，中日九尾狐作为妖兽时，若作恶，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反之，若九尾狐从善，则会获得好的结局。这体现了中日两国邪不胜正的理想心理和惩恶扬善的善恶观。

中日九尾狐的形象变化也有诸多不同之处。

第一，相较于日本的九尾狐形象，中国的九尾狐形象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九尾狐具有瑞兽、妖兽、妓女、奸臣、入侵之敌、淫荡女性、祸国殃民的女性等多重意蕴。这一特点受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而日本九尾狐形象较为单一，一般仅被视为瑞兽和妖兽。这是因为在古代，比起九尾狐，日本人更多关注信仰的是狐这一本土动物，他们认为狐狸是稻荷神的神使。因此，相比之下，古代日本人对外来的九尾狐关注度并不太高，所以关于九尾狐的文献相对较少，少数影响力大的中国九尾狐形象，如妲己等传入日本，并经过本土化改编。

第二，中日九尾狐虽都有化身为女性，引诱男性的描写，但其重点有所不同。比如，中国的九尾狐化为绝世美女，成功诱惑了帝王，倾覆了国家，重点是凸显九尾狐的危险性。而日本的一种九尾狐则虽变为了绝世美女，引诱天皇，但并未成功，没有倾覆国家，最终被杀死，重点是凸显九尾狐的失败及国家的强大。这与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背景有关。中国的女祸观的发展逐渐夸大了女色的威力。《国语》中认为夏、商、西周三代的灭亡都是因国王宠信妇人、妇人干政所致。司马迁也秉持此观点。刘向的《烈女传》——罗列美女祸国祸家的故事。唐朝安史之乱后大臣刘贽指责杨贵妃祸乱国家。杜甫、李白、白居易等文人更是大力宣扬美女祸国这一观念，宋元小说话本也多又体现女祸观念的故事。女祸观念的不断发展夸大了女性在政治上的负作用，故多以女性形象出现的九尾狐的危险性也被夸大。而玉藻前的故事在中世被编造出来，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武士阶级掌握了政权，王权衰退，作者为了追忆昔日王朝的荣光和兴盛，而着重体现王权力量的强大。

四、结论

中日两国在古典文献中对九尾狐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或相同、或不同的思想文化。其中主要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压抑及扭曲。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重要的视角。随着

研究的深入，如何深度剖析九尾狐形象所蕴含的民族心理内涵，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山海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班固.白虎通[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张德鑫.数里乾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赵晔.吴越春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5]瞿昙悉达.开元占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 [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郭璞.玄中记[A].鲁迅全集:古小说钩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8]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9]陈均编、许沛藻等整理.皇朝编年纲目备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0]赵令畤.侯鯖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1]陆游撰,钱仲联点校.剑南诗稿上[M].长沙:岳麓书社,1998.
- [12]杨维禎撰:《铁崖先生古乐府》卷六,《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刊本,第8页.
- [13]江荫香.九尾狐[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 [14]李丰楙.神化与变异:一个“常与非常”的文化思维[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5]李炳海.从九尾狐到狐媚女妖——中国古代的狐图腾与狐意象[J].学术月刊,1993(12):71-75+78.
- [16]李建国.中国狐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17]王雅倩.中日狐女形象比较——以九尾狐妲己与玉藻前为例[J].名作欣赏,2021(18):52-55.
- [18]张程.九尾狐从祥瑞到妖异转变的思想内涵——以汉唐为中心的考察[J].湖北社会科学,2017(06):125-129.
- [19]蔡堂根.九尾狐新解[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1):87-93.
- [20]许净瞳.论古典文献中九尾狐形象之流变[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124-128.
- [21]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21.